

從毛共對非洲的宣傳看其政治動向

楊逢泰

前言

毛共對非洲的滲透是包括文化、經濟、政治和軍事的一項綜合的陰謀活動；配合着一個大規模的宣傳攻勢，企圖以說服的方式，來達到其他方式所不能達到的目的。北平非常注意宣傳工作，認為宣傳是征服人心最有價值的武器，毛澤東曾說：

什麼是宣傳，不僅教師是一位宣傳人員，新聞記者是一位宣傳人員，文藝工作者是一位宣傳人員，而且在各種工作中，我們全體幹部都是宣傳人員……凡與任何另外一個人說話的人就是從事宣傳工作①。

根據毛澤東的解釋，凡是北平派往非洲的「工作人員」就是「宣傳人員」，他們的「言論」就是「宣傳」。事實上，北平對非洲的宣傳工具頗為廣泛，尚有書刊、電影、無線電廣播和其「喉舌」所發表的言論在內。本文的主旨在研析從一九五五年迄今，北平主要喉舌對非洲宣傳的內涵，從而瞭解北平的動向和其陰謀，因為北平喉舌的聲音是其行為的信號，對其他國家而言，是測定北平政治風向的「風信雞」。

「權力政治」的考慮和「世界革命」的夢想支配着北平對非洲的政策。這兩個因素也將北平捲入與美蘇對抗的漩渦中。非洲大陸變成了毛共攻擊美蘇兩國的「戰場」，只是中共喉舌的聲音代替了槍砲聲而已。北平在非洲的宣傳是利用非洲人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心理，來攻擊美蘇兩國。因此，北平對非洲的宣傳是以前與美蘇兩國的關係為樞紐，就中共與美蘇兩國關係來看中共對非洲的宣傳可以分為以下五個時期。北平透過其喉舌，在不同的時期，進行宣傳，以一特殊的目標作為其攻擊的對象，以達到其預定的目的，就此意義而言，非洲只是毛共所利用的工具而已。

蘇俄社會主義國家：反「新老殖民主義」的強大因素

韓戰結束以後，毛共準備攻佔台灣。但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美國國會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通過了「台海決議案」暫時阻止了毛共攻台企圖②。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以後，毛共開始與非洲接觸。中共認為「反殖民主義是強大的力量」，因此企圖利用亞非的反殖民主義力量來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鬥爭。一九五七年三月，周恩來在「訪問歐亞十一國報告書」中說：「亞非國家雖然在物質力量上尚不強大，可是只要我們能維持團結並且和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力量堅強的聯合起來，從事堅決的奮鬥，可以頓挫殖民主義的一切壓力③。」北平強調團結的價值觀念，希望聯合亞非國家組織以蘇俄為首的包圍西方的「統一戰線」。

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蘇俄在軍事上已掌握可以抵制美國核子武器的優勢。在毛共的心目中，殖民地 and 次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要與「美帝國主義」鬥爭，因此蘇俄是否把握此一機會，攻擊「帝國主義」是蘇俄是否希望被壓迫民族完成解放的試金石。是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毛澤東親率代表團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的莫斯科會議，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調，毛澤東強調：

現在我們已經感覺到國際情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捩點，世界上現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為目前的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④。」

北平認為蘇俄甘心與美國「妥協」，不願全力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事實指出，到了一九五七年底，蘇俄的核子武器並不是中共可以自由運用的。「外交」與「內政」具有密切的關係，往往相互的影響。毛共在外交上所受的頓挫特別反映在其對內的措施中，北平決心全力建立核子武裝和發射系統。一九五八年五月，劉少奇宣佈「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而開始「大躍進」，建立「人民公社」和恢復「民兵」制度，此時，非洲在毛共的「議事日程」中顯示其重要性，在非洲所展開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北平希望能證明莫斯科低估了非洲事件所提供的機會。此時，北平在宣傳上和行動上均支持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剛果（雷堡市）的魯孟巴政府，而「美帝國主義」是主要的攻擊對象。

黑魯雪夫不願扶植一個核子夥伴，因此一方面高彈「和平共存」論調，一方面鼓吹部份核子禁試條約，藉此而拒絕進一步給予毛共核子技術^⑤。一九五九年六月，黑魯雪夫正式中止蘇俄對中共核子技術的援助，是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和彭德懷的遭到清算，使北平與莫斯科的關係到達了「大江東去不回頭」的地步^⑥。

遲至一九六〇年初，北平喉舌尚在標榜蘇俄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人民日報」在一九六〇年一月一日刊登「爭取和平鬥爭的大好形勢」一文，除頌揚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外，並引用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所著「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文，攻擊「美國霸權主義」，該文稱：

蘇俄是世界和平的保衛者，是阻礙美國反動派建立世界霸權的強大因素。有了蘇俄，美國和世界反動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實現，因此美國反動派非常痛恨蘇俄，確實夢想消滅這個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列寧九十歲生日時，北平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除對莫斯科作為社會主義陣營最高主宰的權利提出挑戰外，並提出了三個問題：

第一、「帝國主義」問題：「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指出，「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資本主義，就還存在着戰爭的根源，還存在着戰爭的可能性」，「美帝國主義是當代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從毛共對非洲的宣傳看其政治動向

第二、「和平共存」問題：「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強調，「實行和平共處（存）的障礙在帝國主義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同帝國實行一定時期的和平共處，完全是鬥爭得來的。」該文並否定被壓迫人民與壓迫者之間的和平共存的可能性，認為「和平共處僅是國家與國家相互關係的問題，革命說是本國被壓迫人民推翻壓迫階級的問題。而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說來，首先是推翻國外壓迫者，即帝國主義問題。」該文指責黑魯雪夫利用「和平共處」的名義在國際範圍內以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

第三、「民族解放運動」問題：「列寧主義萬歲」一文認為「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是當代世界基本矛盾之一，美帝國主義是現代殖民主義的堡壘，是當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風起雲湧的民族解放運動最兇惡，最狡猾的敵人。」並且指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必須依靠自己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沒有革命的暴力，就不能消滅反革命的暴力。」^⑦

「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再度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調和「社會主義陣營在一九五七年已勝過資本主義」的看法，對於蘇俄未能及時攻擊「帝國主義」表現一種希望幻滅的悲哀。兩個月以後，即六月二十二日，黑魯雪夫在羅馬尼亞共黨大會上指責北平所鼓吹的「教條政策」，七月，莫斯科撤退了所有俄國「顧問」，正式關閉了核子俱樂部的大門，北平——莫斯科的「同盟」壽終正寢，「列寧主義萬歲」就是它的墓誌銘。

蘇俄修正主義者：美帝國主義的辯護士

一九六〇年秋天是北平與莫斯科關係的分水嶺。雙方終於瞭解，權力政治的考慮和為了控制共產運動，必須準備長期鬥爭，北平與莫斯科的歧見其焦點集中在對西方，尤其是對美國的敵意，而此項共同的敵意使雙方對全世界共黨的組織和控制，以及如何奪取政權的路線的觀點作不同的看法，因而影響二者在非洲的活動。莫斯科控制暴力衝突的危險，主張採談判的方式，包括與主要敵人——尤其是美國的談判在內，一切局部的衝突，包括殖民地的「解放戰爭」在內均應以「和平共存」為指導原則；而北平堅持「武裝革命」。在此時期，北平攻擊的主要對象是「老牌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

義」，前者以西歐國家為代表，而後者以美國為代表，而以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和剛果的動亂，將二者聯繫在一起。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刊登「非洲的覺醒」一文說：

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戰爭已經為非洲各國人民樹立了一面爭取民族解放的光輝旗幟……儘管那些老牌殖民主義者企圖在非洲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的汪洋大海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是它們註定了絕不可能逃避沒頂的命運……當着舊殖民主義者在非洲接近滅亡邊緣的時候，一個更加兇惡、更加陰險、更善于偽裝的新殖民主義——美帝國主義正在對日益高漲的非洲民族運動形成愈來愈嚴重的威脅。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非洲國家首腦會議在卡薩布蘭加舉行時，「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名為「非洲的命運要由非洲人民來決定」的「社論」，首先指出：

非洲各國人民僅僅從剛果和阿爾及利亞的例子中就能充分地認識到這個真理，特別是剛果事件的發展，對非洲各國人民提供了最深刻的教訓，那就是：舊的宗主國絕不會自動地放棄自己的殖民地。

該文隨後引用迦納「新聞晚報」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載的文章中所稱「殖民主義者在美國率領下對剛果進行的干涉是說明在非洲的集體殖民主義的最鮮明的例證之一」，進而指責美國「企圖取代舊殖民主義的地位」。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因「大躍進」時期經濟受到嚴重挫折而減少對非洲的活動⑧。一九六二年七月，阿爾及利亞已經獨立，可是並沒有如北平所希望的「掀起吞嚥整個非洲大陸的革命浪潮」，北平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東非、中非和南非，而其宣傳攻勢的箭頭指向了非洲的心臟——剛果（雷堡市）。一九六二年底，「新華社」記者在「民族解放鬥爭深入發展」的報導中稱：

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烽火正在向殖民主義者視為最後基地的東非、中非和南非轉移，怯尼亞（肯亞）、桑吉巴爾（桑西巴），南、北羅德西亞，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的人民正在為加速實現民族獨立展開激烈的鬥爭⑨。

此時，阿爾及利亞的戰爭雖然已經過去，而剛果的動亂正方興未艾，毛

共的經濟稍為復蘇，再度向非洲進行活動，援助剛果金夏沙政府的反對份子為此一時期的中心工作⑩。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非洲自由日」發表「爭取反對新老殖民主義鬥爭的徹底勝利」的「社論」，就剛果的糾紛，強調「團結」的觀念，該社論稱：「美國曾經使用卑鄙手段，分化了剛果的反帝力量……因此，非洲各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旗幟下，進一步加強團結，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該「社論」進一步要求亞非拉丁美洲的團結和組織更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可是在這篇社論中隻字未提其社會主義的「盟友」——蘇俄，因此，所謂亞非拉的「反帝統一戰線」並不包括蘇俄在內。一九六三年冬天和一九六四年春天，周恩來訪問非洲，在索馬利亞結束其訪問時，強調：

在非洲存在着一個絕好的革命局勢……非洲人民正在經由消滅殖民力量，要求完全摧毀殖民主治，許多非洲國家的人民已經贏得獨立，而且正在推動革命，其目的在貫徹人民民主革命和建設他們自己的國家⑪。周恩來的談話中，一方面放出了支援南部非洲反殖民主義的「解放鬥爭」，一方面也表示毛共對非洲的旨趣已超越了其早期反殖民主義的「解放鬥爭」，而注意到非洲國家的「建設問題」。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周恩來在接受迦納新聞記者的訪問時，提出了中共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之八項原則⑫，準備積極「援助」非洲國家，向蘇俄的「援助」提出了挑戰，塔尚鐵路就是周恩來在一九六五年六月第三次訪問非洲時所承諾的。

在這一時期，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敵意已逐漸升高，北平的喉舌一方面宣揚「美帝國主義」是第三世界共同的敵人，一方面已將「蘇修」指為「美帝」的「辯護士」。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人民日報」在「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一文中轉載「紅旗」的「社論」說：

現在，我們紀念列寧主義的主要任務是堅決保衛列寧主義的革命原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者對列寧主義的歪曲，把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同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緊密地聯起來。

該文並引用一九六〇年「列寧主義萬歲」一文，重提「帝國主義」、「和平共存」和「民族解放運動」三個問題，指責黑魯雪夫「修正主義者，迫於情勢，鼓勵帝國主義侵略」，是「美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和「真正鼓勵美國侵略的人」。是年偽慶，「人民日報」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

前進」的「社論」中揚言『必須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⑬。對蘇俄的敵意似已超過了對美國的敵意。

蘇俄修正主義者：世界革命的叛徒

一般認為林彪論「人民戰爭萬歲」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在「文革」期間，中共喉舌大肆攻擊「美帝」和「蘇修」，尤其是恐懼二者的「合作」。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稱：

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路線同我們的路線是根本對立的，他們背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美帝國主義當作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夢想實現美蘇合作主宰世界。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並沒有完全阻止北平對非洲的活動，而其主要的傾向是非正式的顛覆性的活動，其注意力集中在南部非洲的游擊運動^⑭。一九六七年，毛共已將「蘇修領導集團」視為「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而發出「反帝必須反修」的論調。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引用南非泛非洲主義大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駐倫敦副代表的話說：

全世界人民在反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同時，必須反對以蘇共領導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蘇聯修正主義者已經背叛了世界革命……^⑮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東事件爆發，北平利用以阿糾紛，一方面煽動阿拉伯國家反美，一方面將美國、蘇俄和以色列牽連在一起，予以猛烈的攻擊。十二月三十日，「文匯報」稱：

一九六七年是蘇修反革命叛徒真面目在非洲大暴露的一年……非洲革命人民從中東事件中，更加清楚地認清了蘇修是如何採取反革命兩面手法，出賣中東人民的利益，替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效勞的。非洲人民無比憤怒的譴責蘇修是「可恥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同盟者」和「被壓迫人民的兇惡敵人」。

到了一九六八年，蘇俄在中共的心目中，已「墮落為美帝奴役非洲人的幫兇」，和「非洲人民的假朋友」，而且正在「同美帝國主義一道策劃了摧毀非洲解放運動以及奴役這個大陸上不願屈從華盛頓和莫斯科的人民和國家的陰謀詭計」^⑯。

從毛共對非洲的宣傳看其政治動向

一九六八年三月，美國孟斐斯（Memphis）的黑人發生騷動，四月四日美國黑人領袖金氏（Martin L. King）被刺，北平利用此一機會，一方面企圖爭取非洲黑人，一方面煽動美國黑人，來破壞美國社會的秩序。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以第一版全部篇幅和特大號字體，刊登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在這篇「聲明」中，毛澤東直率的鼓勵美國黑人革命，而且將美國黑人的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呼籲全世界人民「向着我們的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當然是指蘇俄而言）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

蘇俄修正主義者：美帝國主義的夥伴

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舉行「九大」之後，雖然採取了許多步驟來抵銷一九六七年中紅衛兵的反外國主義，並且積極的加強「政府」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可是另一方面，它更積極的支援南部非洲的游擊運動，和利剛果（金夏沙）來攻擊美蘇兩國。其時，蘇俄力圖與莫布杜政府改善關係，七月底，莫斯科邀請剛果（金市）外長訪問蘇俄，北平大為憤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報」指責莫布杜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是剛果的賣國賊」；並稱莫斯科和華盛頓正在合謀「破壞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企圖把那裏的革命烈火撲滅下去」^⑰。

一九七〇年的春天，北平向莫布杜發動了一連串的宣傳攻勢。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繼續深入發展」的報導中，一方面指控：「社會帝國主義同美帝一樣是非洲人民的敵人」（也就是中共的敵人）；一方面攻擊金夏沙政府稱：「剛果人民開展的愛國武裝鬥爭，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剛果的走狗的反動統治」。

尼克森總統就職以後，「人民日報」於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攻擊「尼克森主義」：認為尼克森所謂的「伙伴關係」，「就是要在非洲和阿拉伯國家扶植像剛果（金）蒙博托（即莫布杜）傀儡集團那樣的完全聽命於美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權，使非洲和阿拉伯國家一個一個變成像剛果（金）那樣的美國事實上的殖民地」^⑱。從「人民日報」的這些報導中，顯示北平是如何不擇手段

利用宣傳和支援剛果的叛亂組織，而達到它滲透剛果和攻擊美蘇的目標。因為剛果位於非洲心臟地帶，北平在爭取剛果之後，即可填補中非地理方面的真空，由此向南進攻南部非洲。同一時候，北平的喉舌報導了一連串南部非洲游擊戰的消息和毛澤東「槍桿子裏出政權」的謬論^⑩。

一九七一年初，毛共的喉舌製造了「美帝國主義」已經和「社會帝國主義」合而為一的印象，並且將「亞、非、拉丁美洲、歐洲和大洋洲的革命羣衆」聯合成爲一體，一月一日，北平三個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紅旗」和「解放軍報」在聯合新年「社論」——「沿着毛××革命路線勝利前進」一文中引用毛澤東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認爲「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但是「當前世界主要傾向是革命」，該「聯合社論」宣稱：

世界處在革命的大變動的過程中，革命形勢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當代世界各種基本矛盾的進一步激化，美帝國主義以及社會帝國主義對各國人民的侵略、壓迫和控制，推動着億萬人民起來革命，我們看到：各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的革命鬥爭和各國人民反對本國反動派的革命鬥爭，緊密匯合；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歐洲、北美、大洋洲的革命羣衆運動互相呼應。

既然「社會帝國主義」的大兵壓境，威脅著中共偽政權的生存，其危險性事實上不能與「美帝國主義」相提並論，因此，「聯合社論」所發出的「信號」，不啻是要求與美國「解凍」，聯合起來，對付蘇俄的邀請書，緊接着這個「信號」之後，北平利用「兵兵外交」作爲外交笑臉攻勢的工具。因此凍結了二十多年的美國與毛共的「關係」顯露了「解凍」的跡象，從此以後，北平對美國不再作刻薄的攻擊，而籠統地攻擊「大國霸權主義」，而且將「蘇修」包括在內。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

目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起來反對大國霸權主義……：一兩個超級大國，自以爲可以擺弄、欺凌和損害別的國家。是誰賦予他們這樣的權利……：現實就是這樣的無情，誰想把別人踩在腳下，作威作福，稱王稱霸，全世界人民就羣起而攻之，直到把它們徹底打倒。

北平之所以同時攻擊美蘇霸權主義，其目的在尋求一項公式，表示其與美蘇對國際事務採取不同的態度，同時北平企圖建立的反帝統一戰線已擴大到整個世界，其攻擊的主要箭頭顯然指向「社會帝國主義」。

毛共所採取的「笑臉外交」的後面依然是「槍桿子」在支持着，它的宣傳和軍事活動顯示其對非洲攻勢的遠程目標——進行「世界革命」，並無任何改變。「紅旗」於一九七一年第四期刊載，「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來「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該文揚言：「今天，巴黎公社帶起的革命火炬在全世界熊熊燃燒，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末日已經爲期不遠」。該文並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的努力，而且有待於世界革命的勝利。」

蘇俄社會帝國主義：最新穎的殖民主義

毛共混入聯合國後，對南部非洲白人殖民地和種族隔離政策實施更大的壓力。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黃華在安理會就非洲問題發言時，除指責「大國霸權主義」外，他說：

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正同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一道匯合成一支強大的革命鬥爭洪流，猛烈的衝擊着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非洲局勢的發展雄辯的證明，國家需要獨立，民族需要解放，人民需要革命，是當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⑪。

一九七二年，聯合國應非洲團結組織的要求，破例在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召開安理會特別會議，北平要求援助南部非洲的「解放組織」。南非、羅德西亞和葡萄牙在南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扮演的角色一樣，阿拉伯國家和漠南非洲國家彼此交換支持的立場。北平反對以色列和支持南部非洲游擊組織可以換取雙方的同情和支持，使其本身在整個非洲和中東扮演重要的角色，所以北平掀起了反以色列的宣傳，而且將攻擊「大國霸權主義」串連在一起。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慶祝「非洲解放日」九週年，僞「對外友好協會」負責人王國權在大會上說：

非洲國家同其他各洲的中、小國家一道，正在進一步聯合起來，反對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北非和西亞的阿拉伯國家和巴基斯坦人民堅持進行反對美帝支持下的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侵略的鬥爭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幾內亞總理訪問北平。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喀麥隆總統訪問北平，周恩來在歡迎的宴會上，重彈反對「大國霸權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老調③。北平喉舌之所以異口同聲在譴責「大國霸權主義」的同時，攻擊「猶太復國主義」，除爭取阿拉伯世界的同情外，具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因為蘇俄由陸權國家脫穎而出為海權國家，如果蘇俄的黑海艦隊能順利而迅速的經蘇伊士運河而到達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對中共構成了海上包圍的威脅。所以在中東事件發生以後，中共始終在煽動以阿之間的糾紛。在反「猶太復國主義」的背後，隱藏着對蘇俄海上威脅的恐懼，毛共的喉舌最近一再的發出恐懼「大國海洋霸權主義」的信號。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大公報」刊登了阿卜杜·里法在「亞非記者」一九七三年一月號所撰，「蘇俄在東南亞的擴張滲透」一篇譯文稱：

蘇聯社會帝國爲了要從黑海，通過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以至日本海的廣闊海域上進行擴張，建立霸權……：蘇俄正策劃在葡屬帝汶島建立海軍基地，蘇俄曾爲了這項計劃與葡萄牙當局進行秘密談判。

該文又說：

蘇聯勾結西方的殖民主義國家，侵犯別國主權和入侵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領海，是莫斯科主子們背叛列寧原則的明顯罪證……：世界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變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引用紐約時報的報導稱：「蘇俄已在非洲索馬里共和國設立了一處長距離通訊設施，可以用來直接操縱蘇聯艦隊通過印度洋。」「大公報」進一步指出：

蘇聯大量軍援索馬里，派遣二千五百名軍事人員，其目的在利用索馬里與埃塞俄比亞（即衣索比亞）之間的緊張關係，取得在非洲東海岸的一個立足點，以適應蘇聯海軍越來越頻繁的在印度洋海域活動的需要。

同日，「大公報」刊登「蘇聯在歐亞非的軍事活動」一文，露骨的發出了恐懼的信號，該文稱：

從毛共對非洲的宣傳看其政治動向

社會帝國主義在世界各地不斷增兵，一方面是與美國進行爭奪，另一方面也是企圖對於鄰國進行威嚇，它的嘴臉越來越醜惡了。

字裏行間似乎透露了「社會帝國主義」已經「取代了「美帝國主義」，而要求美國予以援助之意」。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新華社」的記者談「非洲解放日十週年形勢」時已不再攻擊「美帝國主義」，僅說：

近年來，非洲國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道，積極展開反對大國海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鬥爭……：北非沿海國家發出了「地中海是地中海國家的地中海」的強烈呼聲，東非和中非許多國家表示堅決支持「印度洋作爲和平區」的正義主張，這充份表達了非洲人民保衛領海主權和維護本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要堅決同超級大國爭奪海洋霸權的擴張主義進行鬥爭的決心。

結論

從一九五五年迄今，北平對非洲的宣傳主要是攻擊美蘇兩國，從反「新老殖民主義」、「美帝國主義」、「蘇俄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大國霸權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到「海洋霸權主義」，顯示北平與美蘇兩國關係的滄桑。

北平善於利用其他國家的矛盾，以不同的宣傳伎倆，配合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甚至軍事的滲透，以達到其預定的目標，儘管北平善變而陰險，但是毛澤東本人或其喉舌，自始至終，坦誠的在非洲宣揚「槍桿子裏出政權」的「革命經驗」，企圖以「中（共）國式的革命」來發展「世界革命」。北平在非洲一方面鼓勵非洲人以「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奪取政權，一方面希望與非洲國家建立「統一戰線」，來與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鬥爭。一九六〇年以後，與蘇俄的敵意逐漸升高。目前，北平在非洲，在第三世界，甚至整個世界，建立一個將「蘇修」排斥在外的「統一戰線」，而其攻擊的箭頭指向着「大國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海洋霸權主義」。在反「猶太復國主義」後面隱藏着對蘇俄在海上擴張的恐懼，這是北平最近發出的信號。蘇俄脫穎而出成爲一個海權國家，對美國是一種挑戰，對北平則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威脅。

一九六〇年以前，毛澤東企圖借東風來壓倒西風，現在北平的政治風向已經改變，毛澤東正在企圖借西風以壓倒東風。

註① Brent Hutton-Williams, "Communism in Africa: Words as Weapons," Bulletin of the Africa Institute of South Africa, Vol. IX, No. 5 (June 1971), p. 219.

註② 丘宏達，「中美關係的最新發展評論」，人與社會，第一卷第二期（民六十二年六月），頁四。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Cited in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23.

註④ 引自陳福到，「匪俄交惡與核子論爭」（下），匪情月報，第十六卷，第五期，頁八十一。

註⑤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2.

註⑥ William E. Griffith, The Sino-Soviet Rift (Cambridge: The M. I. T. Press, 1965), p. 118.

註⑦ 引用「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一文轉載「列寧主義萬歲」一文的内容。

註⑧ Bruce D.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A Prospect on the 1970s" Africa Today (July 1971) p. 7.

註⑨ 「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註⑩ 同註八。

註⑪ Cited in Colin Legum, "Africa and China", in A. M. Halpern(ed.) Policy Toward China: View From Six Continents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65) p. 396.

註⑫ See Larkin, China and Africa, pp. 103-106, Passim.

註⑬ 「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社論」。

註⑭ 參閱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香港「大公報」所發表，「戰鬥的大陸——非洲」一文，及十二月三十日，「文匯報」刊登的「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一文。

註⑮ 「蘇修領導集團是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⑯ 「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

註⑰ 參閱周谷平，「赤龍赤熊在非洲激鬥」，星島日報，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

註⑱ 「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粉碎美帝顛覆陰謀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

註⑲ 參閱「人民日報」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繼續深入發展」一文；四月一日「堅決支持非洲人民粉碎美帝顛覆陰謀的鬥爭」；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聲明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沉重打擊」一文；十月三十日「滿懷信心地沿着武裝鬥爭的道路前進」一文。

註⑳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

註㉑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註㉒ 參閱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和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日。

本所副研究員張耀秋先生近著：

三民主義與世界前途

每冊定價新台幣十五元

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